

2020—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评价报告(选刊之七)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王海晗 文贵良

DOI:10.19862/j.cnki.xsyzk.000764

作为一个与社会互动关系密切并且仍在不断自我扩容中的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以来都是知识生产与学术批评的重镇,其研究成果之丰厚,研究力量之强大,研究工作之活跃,在中国的专业体系当中是十分突出的。2020—2022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各个领域方向上深度挺进,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多部重量级的著作相继问世,各类论文也相得益彰。学术界有必要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述,但面对海量的文献,本文只能选择那些显著推动文学史研究,促进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更新的部分进行评价,总结其创新贡献以及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以期能够精要地呈现出三年来本学科内学术研究的推进情况。报告按八个模块依次展开: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与史料问题研究

文献与史料工作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原动力,这一方面的成果十分丰沛,笔者重点谈两个方面。其一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构。2020年,陈子善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从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等十个角度进入论述,每一部分以若干个案来分析,具体展示中

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过程。陈著最为直接的贡献当然是史料的挖掘、披露与辨析,作者是文献研究的大家,在材料把控上得心应手。当然史料只是在一个基础的层面提供支撑,更为关键的是史料背后所展现的文学研究的方法意识,作者选择的十个方面虽然各有自身的特色,但同时也是彼此关联的一个有机系统,通过互相之间的串联就能派生出一套完整的文学文献学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框架,将实证主义史学观念引入到文学研究的系统中,从而与既有文学史形成对话,给予学界以启发。除了这一本标志性著作,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传统、学科建制与具体内容等,也出现了一些理论探讨的文章,比如赵奉蓉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中心及边界》^①,又比如金宏宇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汇编以及注释的论文^②,同样值得关注。其二则是当代文学历史化与史料问题研究。经过十来年的探索,当代文学历史化及其“史料学”转向已经成为一种学术潮流,二者之间关系密切,眼下诸多学者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延伸着这一问题的论域。王秀涛提出当代文学的史料等级问题^③;武新军谈论当代文学史料整理的问题及努力方向^④;张均将古典考据学重要方法之一的本事批评引入当代文学的理论视域^⑤;程光

① 赵奉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命名、中心及边界》,《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2年第2期。

② 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汇编批判》,《东吴学术》2021年第2期;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注释现象之考察》,《长江学术》2021年第2期。

③ 王秀涛:《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④ 武新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⑤ 张均:《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可能与方法》,《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张均:《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炜发出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的提议^①；黄发有论述当代文学罕见史料的意义与处理方式^②；斯炎伟辨析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③；吴秀明讨论当代文学历史化内部多元因素的张力关系^④等等。可以想见的是，当代文学历史化与史料问题因其内在含义的丰富，必然会引发不同的观点评价乃至分歧，但是近年来的论文却是在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某些正向的共识观念，在几个维度上提供借鉴意义：首先，历史化与史料问题的提倡显然有助于建立一种有别于“批评化”的文学研究路径，但史料与批评，历史化与当代性并不是对立的关系，相反却可以融汇在学理性的文学批评中，预示着当代文学研究多元共生的格局。其次，历史化与史料学的转向是关涉当代文学学科自律与稳定的关键点，因而这一研究动向对夯实当代文学学科基础、完成自身合法性论证、建立制度性的学科身份具有积极的价值。最后，史料整理对丰富文学史细节有所帮助，但这仅仅是其基础性功能，更重要的是要以鲜明的问题意识面对史料，通过关联与对照，发现整体性意义，不断激活史料的思想功能，从而把文学还原为一种历史实践过程。更进一步来说是在史料基础上，将当代文学学科背后的认知框架进行历史化，这样就脱离了为史料而史料的窠臼，而是以史料为方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现代文学文体与语言研究

众所周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其修辞表达的艺术机制及其美感体验，2020—2022年间，现代文学界涌现出两部标志性的著作，分别就与文学性生成密切相关的文体与语言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陈平原著《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下称《述学文体》）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正式出版，在此之前，他已经相继完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与《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两部大著。从“学人精神”到“学科体制”再到“述学文体”，这一系列的写作虽然蔓延日久，但却环环相扣，珠联璧合，因而可以合称为陈氏的“学术史三部曲”。作为其中的收官之作，《述学文体》甫一面世即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从历史的层面来讲，陈著是目前唯一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述学文体的专著，述学文体这一概念本身及其作为研究范畴的提出，无疑彰显出某种自成一家的学术理念。

在谈及《述学文体》一书时，陈平原说“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⑤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不仅是思想文化的更新与创造，同时也在转型时代学者的思维/表述方式上获得了症候性的体现，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述学文体的探讨兹事体大，述学文体并非纯粹“有意味的形式”，而是关乎一时代之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纵观全书，前三章以专题的形式铺展，围绕“引文”与“演说”两大中心议题展开，后五章分别论述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与胡适五大家的述学文体，属于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由此陈平原以一种点面结合的方式勾勒出一幅现代学术与现代文体交融生长的图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并未脱离文学的语境，述学文体本质上是“内在于学术的文体”，其思考的重心是学者的表述如何兼及学术思路与文章趣味，学问中的文学精神与趣味自然就构成了其重要的分析对象，而这种使文章与著述合一，沟通文/学的辩证视野恰恰能够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显示出巨大的洞见性。晚清以降，随着日趋专业化的知识分科制度的确立，现代学人的述学著作基本从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消失，在当今的文学研究界，有关创作文体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鲜有人问津“学术文”的内在理路。与此对照，陈平原的突破创新即在于别出心裁地把学问家也作为一种文体家来把握，将有关学术的专业著述也纳入20世纪文学史书写的范畴。换言之，述学文体的背后牵涉到整个现代文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新文学不仅来自白话文学，同时也来自白话学术的“赞助”作用，将这一思路贯彻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就能够打破原有的文学研究框架，使得历来为人所忽略的现代文学史之暗面显影出来。不过正如作者已经提到的，《述学文体》的内在肌理是随着时间发展一步步生发出来的，其章节设计主要针对的是鲜明的个案，这当然使得其论述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紧贴时代脉搏，但这种方式也必然带来整体意识相对薄弱的缺陷，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冲突，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作者接下来在相关方向上的研究。

文贵良著《文学汉语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下称《文学汉语实践》）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十多年来从事文学语言问题研究的集

① 程光炜：《当代文学“历史化”琐谈》，《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程光炜：《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罕见史料开掘的意义与方法》，《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③ 斯炎伟：《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的几点辨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④ 吴秀明：《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需要正视的八个问题》，《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⑤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页。

大成之作，具有完备的理论结构与突出的价值导向。众所周知，“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因而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同源共生的关系，文学语言亦常常被视为与新文学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元问题。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审视文学史，实际上就是抓住了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本位与基质，正是秉持着这种理念自觉，作者在文学语言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之间找到了一个关键的连接点，那就是文学汉语实践。在他看来，各种语言因素的吸收都需要通过实践这一环节，所以在个体的文学汉语实践中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一种最为合理且有效的描述方式。基于此，文贵良择取了黄遵宪、严复、梁启超、林纾、章太炎、王国维、吴稚晖、胡适、鲁迅、周作人这十位代表性作家，组成晚清民初的“轴心作家群”，主要从文学汉语的“理”“情”“文”三个维度展开考察中国近现代时期的汉语实践以及这些实践在历史中的变化与影响。文著建构的三位一体的语言概念体系表现出非常强的延展性，“理”考察的是汉语的知识体系，剖析汉语造型不断改造与锻炼的状态，“情”指向的是语言主体的维度，以此透视语言背后个人与国家主体性的生长，“文”指向的是文学汉语实践所催生的文体形式的演变，事关新的文学“表现法”的生成。与文学界惯常认知的“语言”研究相比，《文学汉语实践》一书并非是在修辞学的框架中对具体作品进行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分析，也不是仅仅在知识结构的层面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文白转型，而是经由文学语言实践对于人之主体性的勘探，最终抵达有关文学现代性的理解。通过还原从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建立前后异彩纷呈、互动共生的语言图景，作者能够为“五四”新文学进行一种追本溯源式的发生学考察，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上提供有力的解释。在方法论的层面，本书贯彻一种“以语言为核”的本位研究理念，力图从“文学汉语实践”出发来重构新文学的发生语境，这与既有的多种阐释框架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丰富了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包含着某种突破原有文学研究框架，建构自身文学批评理论的学术抱负。

三、当代文学形式与诗学研究

文学的形式分析是文学“内部研究”的重要方法，这在当代文学研究界有着十分充分的体现，当然这种形式分析与诗学研究并不是走向封闭的文本，而是与更为广阔的历史内容互为表里。以下两部新著分别就当代文学的两个特殊阶段：“一体化”结构严密的1940—1970

年代以及众声喧哗的新世纪立论，以具体创作实践为立足点，致力于开拓一种具有厚重思想内涵的形式诗学。

2020年贺桂梅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出版。在本书中，贺桂梅试图以民族形式为线索来思考当代文学的“中国性”内涵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在贺桂梅看来，民族形式的书写关涉到革命中国的建构问题，当代文学作为革命中国自我表达的文学形态，可以成为探讨民族形式问题的重要媒介。换言之，从民族形式入手，是希望寻找到一种更准确的“语言”来考察1940—1970年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这是因为民族形式问题所强调的“中国性”这一面向，始终构成着当代文学实践的核心内容。贺桂梅的研究思路具有很强的创新价值，从历时层面来说，民族形式这一范畴及其相关概念最初发源于1930—1940年之交的民族形式论争，有关论争各方的具体观点，学界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与之相区别的是，贺桂梅的视野显然并不局限在论争的实体内容当中，而是把这一论域作为一种方法，将其意义提升到1940—1970年代整个中国政治与文化实践的关键环节，“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从来就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形式问题，而是人民政治、民族形式和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三者的同步建构”。^①由这种高屋建瓴的视点出发，她也得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认为1939—1942年的民族形式论争是中国当代文学除去《讲话》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正是借由这次论争，一种不同于“五四”新文艺之现代文学的当代文学构想逐渐成型，显然这里已经隐含着作者串联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融通意识。在论著的正文部分，贺桂梅选择若干具有典范性的作家个案和文学文本，以之为中心呈现当代文学实践的整体过程，将作家、文本、文学体制、社会结构等诸多文学要素统一起来，思考民族形式的内涵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通过这些细面的剖析，民族形式论争引入的民间形式、旧形式、地方形式与方言土语这一系列核心范畴的内涵都能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层面得到说明，同时民族形式建构之过程又能在长时段视野中得到历史化的观照。贺桂梅以之为中心来重构当代文学史，背后的价值诉求在于凸显中国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这一研究有助于从起源层面来解释当代文学的民族国家品格，思考其知识体制与生产机制。当然本书也并非没有遗憾，最明显的就是正文中较少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须知“民族形式”问题的发生与建构并不仅仅局限于汉民族的文化畛域之内，少数民族的地方性与民间形式同样构成了“中国气派”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由此多民族中

① 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7页。

国的叙述问题应该成为本书的重要议题，对于此，作者似乎应该设计专题予以讨论方能全面把握。

洪治纲《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是一部阐释当代文学审美形态的力作，该书立足于大量创作文本特别是一些新兴作家群体的文学书写，敏锐地提炼出“日常生活”这一观察视角，将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把握。这一思路旨在对碎片化的新世纪文学进行整体观照与深度阐释，并最终开拓出一种新的普遍性诗学。在作者看来，“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书写，在努力建构日常生活诗学的过程中，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理解和思考日常生活的诸多视角，展示了日常生活对于‘完整的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重构人类生活完整性的积极意愿，以及追求身与心、人与物相统一的艺术理想”。^①洪治纲探讨的“日常生活诗学”，建立在“文学是人学”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并且是对后者内涵的提升，重在凸显人本主义的精神诉求。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混杂、丰富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常生活，为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了巨量的写作资源，日常生活的“小我”其实包容了丰富的审美信息，从这一视角来看，“日常生活诗学”是一个产生于特定文化语境同时又能作用于当下现实的重要批评理论。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始终着眼于现代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的互动互构倾向，剖析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肌理，真正使得文学与大众个体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这对于当前文学理论批评中部分存在的不及物性乃至空洞化的缺陷具有反拨的意义。在文学研究领域里，长期存在着道与术之间的分离，各种时髦的理论话语与微观的文本细读都能各行其是，而在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著作中，也存在着扞格不入，生搬硬套的问题，洪治纲的分析却能自由出入在二者之间，既赋予具体文本以别样的解释，又致力于概念层面的提升，由此提供了新时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

四、文学的制度性因素研究

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从传统的文本分析不断扩展到文学的周边领域，有关文学生态的研究方兴未艾，内容涉及到文学与报纸杂志、文学社团环境、文学史编纂与结构等等，这都可以大致归结为文学的制度性因素，即探究文学的发生机制、规范建设及其历史定位的研究，一些典型的成果梳理如下：

丁帆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下称《制度

史》）由作家出版社 2020 年出版，这是一部体量庞大的通史著作。从内在的层面讲，文学制度关联的是文学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要素，它制约、规定着文学的意义和形式，因而制度研究一向都是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有关文学与制度的关系，目前学界中已经出现了多部专门性的研究论著，研究者一般从文学教育、出版体制、文学社团、读者接受、文学会议及机构等各个与制度相关的专题来切入，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来进行文本周边的考察，极大拓展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在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制度史》则有了进一步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较于之前的专研现代或当代，《制度史》尝试将中国近百年文学制度建构和变迁的历程打通，以清末鸦片战争以后现代文学制度的萌芽期为研究起点，下限一直延伸到 21 世纪，在空间上则是更加注重地域的多元性特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特征对文学制度造成的不同影响，正是在这种流动性视野的观照下，《制度史》致力于搭建一个纵向的史的体系和横向的空间比较体系，实现了结构体例上面的显著扩容，包括网络文学、影视改编、民间刊物、港台文学制度等一系列之前较少关注的内容也被纳入到论述框架之中。第二，相较于之前对于制度的专题性研究，《制度史》的重心在于分析文学史的发生与制度史建构之间的勾连关系，而并不是单纯就文学生态进行外部研究。换言之，《制度史》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文学史的本位意识存在，它关注的是文学现象中的制度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对文学演变的影响，剖析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的互动共生关系。在作者看来，用以规范文学的各种法规条例等“有形的文学制度”与作为惯例或文化传统的“无形的文学制度”合力建构并支撑支配着文学史的走向，厘清纷繁复杂的文学制度的变迁过程实质上是从发生学的视角来解读百年中国文学的内在肌理，这体现出一种鲜明的问题意识，即要求从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来重构文学史写作。寻找到这一新的文学史研究的驱动点，无论是在宏观的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抑或是具体的文学现象解读方面，都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方法路径。

吴俊的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他先后发表两篇文章^②，表达对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思考与研究旨趣。实际上，这种为批评入史的努力也是基于将当代文学学科制度化的某种考量。在学界一般认知中，文学史即是作品构成的历史，而对于与创

① 洪治纲：《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 年，第 480 页。

② 吴俊：《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及其学科建设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绪言节选》，《当代文坛》2021 年第 6 期；吴俊：《批评史：国家文学和制度规范的视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若干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 年第 6 期。

作相伴而生的批评则关注不够，作为晚近新兴学科的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则显得相当匮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吴俊的思考显示出某种前瞻性，在其看来，批评的作用不可低估，创作与批评犹如文学之两翼，缺一不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都只有经过文学批评的生产才能形成自身的逻辑概念体系，无论是从学科专业还是理论建设需求来说，文学批评都很有必要建立自身的历史谱系。吴俊将批评入史的提议，旨在突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建立规范与合法性，有助于当代文学拓展自身的学科结构，形成稳定明确的身份归属。更为深入的是，论者对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还有独特的理念设计，当代文学批评作为国家文学之一种，被纳入整体的权力体系中，由此常常表现为制度刚性与随机性、理论性与政治性的缠绕，一方面受国家政治的社会舆论风向标影响，但又留下了暧昧的自律空间。此种复杂的认知策略深化了对当代文学批评内涵的认知，有助于推动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价值观的重建，从一个新的视角辩证审视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换言之，理想的批评史不仅仅是知识资源的梳理，更是人文精神的透视，关乎一时代文学之价值走向，如何将二者有效结合但又不失各自独特的尺度，则是需要细心体认的问题。

邵宁宁的《从“文学研究会”到“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生成与衍化》^①是一篇别出心裁之作。作者认为学界仅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定义文学研究会是不够全面的，其为人所忽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作为“文学研究”群体的特性，它的成立为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崭新的学科意识与工作伦理，宣告着一种文学观、事业观的确立。正是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就会发现文学研究会的具体组织虽然在1930年代后销声匿迹，但是其理念与主张却经由核心成员得以贯彻和传播，并且一直延伸到1953年成立的中国文学研究所，二者之间构成了或显或隐的联系。该文视野开阔，论述充分，通过社团这一基点来剖析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绵延脉络，不仅打通了不同时段之间文学结构的内在关联，而且对历来学者在考察文学现象时重创作轻研究的倾向也具有某种纠偏作用，有望增进有关文学史内涵的理解。

五、社会史视野及文学的“地方路径”研究

2020—2022年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那就

是之前已经形成风气的一些热点学术话题持续地升温，其理论内涵与思维活力都获得进一步的敞开，其中，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引人注目。《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集中刊发了一组笔谈，倪伟、吴晓东、倪文尖、姜涛、铃木将久分别发表了自身的见解，彼此观念各有侧重，但是分享了共通的学术理念。^②在论者看来，文学研究中引入社会史视野，意在打开作品的意义空间，使得原本封闭的文本走向开放。承认文学形式具有政治和历史的内涵，并不是如同之前的外部研究，片面看重文学对外在社会的反映功能，而是强调文本具有历史的症候性，本身即是历史的审美化与形式化。换言之，这一思路是通过文学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来“历史地”研究文学，是借助社会史来激活一种进入历史化范畴的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学性，最终落脚点仍然在于文学而非社会。社会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摒弃了文学/政治的二元区分模式，为探索文史互动关系提供了有效的窗口，有利于加强文学与现实对话以及重构历史整体的活力，使得文学的生产过程表现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逻辑。这是一个强劲的学术增长点，可广泛应用于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展富有生产性的话题领域，但所谓的社会史视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定则，在面对不同性质的文学对象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层次感，及时调整理论内部的策略方法。

除了已有学术观念的拓展，新的理论概念也在不断酝酿。2020年初，《当代文坛》杂志开始推出李怡主持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学术专栏，截止到2022年，已发表各类论文四十余篇。毫无疑问，“地方路径”已经成为最近两年多时间以来最具热度的学术话题，无论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式亦或是具体的文本阐释实践，“地方路径”都表现出了强劲的生产性，大大激活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活力。李怡提出这一概念有着宏大的问题指向，核心在于通过文学“地方路径”重新辨析“文学中国”整体经验的形成，最终达到改变现有文学认知格局的目的，其本人就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③一文中以成都的地方经验为切入点，通过对李劫人、郭沫若等四川作家的考察，演示了在京沪之外找到一个现代文学原发性起点的可能性。在惯有的地域文学或区域文学研究中，“地方”仅仅是作为国家文学的一种补充，区域只有在被纳入到整体的结构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

① 邵宁宁：《从“文学研究会”到“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生成与衍化》，《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② 见倪伟：《社会史视野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吴晓东：《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再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倪文尖：《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姜涛：《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研究中“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问题》；铃木将久：《“社会史视野”的张力》。以上论文均出自《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③ 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而“地方路径”的提出旨在建立“地方”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①这一别开生面的论述能够照亮现代文学研究中某些习焉不察的理论盲区。长期以来，文学界受到冲击/回应史学模式的影响，认为内陆的文学现代性是在京沪等较早浸润西潮的发达地区的支配牵引下才得以生成，从而潜在树立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等级格局。与此对照，“地方路径”更为注重各个地方在汇入现代性大潮过程中的自发性与独立性特征，强调是不同地域之间的相互激荡最终融合为整体性的文学景观，由此反思了线性的文学地域传播链条。从深层结构来讲，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科学具备很强的组织概括能力，却也表现出一定的限度，其“焦点透视”的功能总是被某种符合因果律的历史逻辑支配，这种整体性描述是以牺牲多元性为代价的。“地方路径”则有望冲击井然有序的现代文学历史解释框架，以“散点透视”来呈现总体面目之下芜杂繁茂的纵深景观，这不仅仅在于其能够引发对一些边缘作家的重新理解与评价，同时也是在“地方”的发现中增强文学研究与批评本身的现场意识。“地方路径”提出以后，围绕这一话题，各种思考也在不同的方向上面增殖，李永东强调“在地性”概念，阐述“地方”的丛聚、转移、流动、伸缩等多重特性^②，刘大先将族群性的视界引入，思考文学中的“满人路径”^③，何吉贤分析了“地方性”因素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作用^④等等，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将“地方路径”贯彻到具体空间中的个案研究^⑤。这些研究与以往的地域文学研究有所区别，它们聚焦于“路径”，更为侧重历史过程的动态追踪，从而显示出新的阐释方向，凡上述种种都在说明“地方路径”是一个具备理论延伸性与批评实操性的学术增长点。不过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概念，“地方路径”的真正实践还有待时间来检验，文学史的写作从本质上来说是经典化的筛选过程，这固然会造成意义的遮蔽，但是在要求“做减法”的前提下又自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地方路径”当然可以在局部形成多个价值维度的补充，但却无法改变文学史叙述的

主流，因而研究者在高度张扬“地方路径”的同时，也应对其自身的限度有着充分的认知。

六、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及其古典资源的研究

近年来，学界屡屡在有关“第一篇”现代小说的认定问题上发生争议，有研究者拈出陈衡哲《一日》、李劫人《儿时影》以及晚清小说，试图以之冲击鲁迅《狂人日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首创地位。刘勇的《“起点”的文学史意义——从“第一篇”现代小说的争议谈起》对此现象有非常精辟的评价与延伸探讨。^⑥在作者看来，文学的“起点”与文学史的“起点”并不能一概而论，文学史的“起点”是历史逻辑的梳理，“起点”不仅仅是一种更新，而是由“点”延伸出“线”，具备持久的辐射力与生命力，能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刘勇对于“起点”的探讨，并不拘泥于时间上的考据，蕴含着其本人对文学作品历史价值的综合判定，虽然只就一个特定的文学问题展开，但达到的却是以局部反观整体的效果，倡导在具体批评实践中锻造综合性的观察概括能力，将作品真正放置在社会结构与时代思潮的转折之中来把握，完成一种复杂的文学历史过程的考察。这一理念对某些仅仅揭示新材料，就单一文学作品价值“过度解读”的思维短视有反思性的价值。由此，“起点”问题的探讨早已超越了时间维度，而是深刻涉及对现代文学发生以及文学史观的认知思路，表现出重要的理论意义。

事实上，有关文学“起点”问题的争议，从本质上显示出一种研究趋向，即部分学者将现代文学的发生再度“问题化”，从“五四”上溯到晚清乃至更长时段的中国古代历史。由此，讨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古典资源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刘春勇的《从长时段视角重审五四与晚明之关联——兼论“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⑦，作者创造性地将晚明的“学术复兴运动”到辛亥五四的历史称作中国在唐宋变革之外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认为晚明以降开启了一个实践力行的时代，中国传统之“文”的实践性与行动性

① 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② 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③ 刘大先：《族群性、地方性与国家认同——百年中国文学的满人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④ 何吉贤：《地方路径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⑤ 譬如蒋述卓、龙扬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共时呈现》，《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谢君兰：《在学堂乐歌与白话新诗之间——成都“草堂—孤吟”诗群的“在地性”研究》，《当代文坛》2020年第6期；张中良：《从晋察冀诗群看抗日文学风貌》，《当代文坛》2021年第4期等等。

⑥ 刘勇：《“起点”的文学史意义——从“第一篇”现代小说的争议谈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⑦ 刘春勇：《从长时段视角重审五四与晚明之关联——兼论“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上下），《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2—3期。

全面启动，由此获得了文学现代性的萌芽。此外，古典资源的议题在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中也多有呈现，譬如王小惠讨论《儒林外史》在“五四”时期的境遇，^①王昭鼎梳理杜甫在抗战时期的形象，^②辛明应剖析桐城文体与《阿Q正传》之间的关联^③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都在以自身的视野方法激活文学的本土语境，一方面审视现代文学观念如何重释古典文学，另一方面分析古典文学资源如何影响现当代文学，从而在民族复兴的精神维度上发掘出文本内外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

七、鲁迅研究

鲁迅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高原地带，2020—2022年间也出现了众多的成果。姜异新《“百来篇外国作品”寻绎——留日生周树人文学阅读视域下的“文之觉”》^④是一篇扎实的文献考述，从阅读史的视域研究鲁迅已不算罕见，但如此详尽地梳理其留日时期的外国文学阅读积累在鲁研史中尚属首次，作者从八个方面的依据入手寻绎鲁迅读过的小说篇目，以表格形式罗列阅读语言、来源信息、藏书情况等，具有高度的资料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抓取周树人阅读过程中形成的“文之觉”，有助于在一个广阔的涵容度下审视“从周树人到鲁迅”的线性思维模式，从而更为复杂地看待鲁迅文学经验的形成。关于鲁迅杂文，学界已经有汗牛充栋的论述，但是张旭东在2022年集中发表的数篇论文仍然让人耳目一新^⑤，他论述的是以《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为标志的“杂文的自觉”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体风格的扩张和各种繁复的试验性。作者的视野十分开阔，通过梳理鲁迅参与现实斗争实践的历史过程，同时联系各条创作线索的文体缠绕，张旭东试图从一个非常广阔的界面回答鲁迅杂文从何产生的关键问题。进一步言之，论者并不将“杂文的自觉”视为某个局部性事件，而是以之导出有关鲁迅文学概念的整体阐释，其核心是诗学形态与政治本体之间的同构共生关系，符合存在斗争与审美政治的原则。张旭东擅长将文学文本放置在宏观的

文化结构中来把握，不仅在鲁迅杂文研究上产生新的认识，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概念的建构也具有启发意义。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刍议》^⑥是其个人多年来研究方向的总结，文中将1922—1928年作为与鲁迅生命前后期并列的一个独立阶段来把握，旗帜鲜明地提出“中期鲁迅”的命题。作者并不将这一时段视为鲁迅的过渡彷徨期，而是凸显其正面意义，着重剖析他在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之后所形成的“同路人革命传统”，这本质上是尝试找到新的原点来建构新的鲁迅形象。邱焕星力图践行“文学政治”的研究方式，将作为精神的文学与作为实践的革命有机联系起来，希望以此弥补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中启蒙范式与主体范式“去政治化”的问题，不仅揭示出鲁迅被遮蔽的某些精神元素，而且重申了鲁迅研究对于现实社会的在场性与能动性。2022年，郜元宝在《小说评论》上开辟专栏“‘我’在鲁迅小说中”，讨论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述的问题。^⑦作者聚焦于鲁迅小说中各种类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解释其复杂的形象与功能，进而探讨“我”与作者、人物的组合关系以及由此造就的丰富多变的表达效果。郜元宝在切入第一人称叙述时并未套用现成的西方叙述学的理论成果，而是立足于扎实的文本分析，最终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达到对于鲁迅创作心态以及小说主题的勘探，充分展现其个人文本细读的能力。在鲁迅研究中，如何从贴近对象的具体问题着眼来扩展到一种文学性的总体分析，郜元宝的这一系列论文可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八、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文学研究

在传统的文学题材之外，作为一种充满想象力与精神解放诉求的类型文学，科幻文学一直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预言者，随着一批中国优秀科幻作品的获奖及其影视改编，最近在学术领域内也出现了科幻文学研究热。吴岩主编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⑧在2022年出版可谓是恰逢其时，本书以时间为线索描述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对本土文

① 王小惠：《五四时期“〈儒林外史〉热”及所牵涉的文学史话题》，《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② 王昭鼎：《古典诗人的现代重塑——杜甫在抗战时期的三重面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3期。

③ 辛明应：《传的解放——桐城文体与〈阿Q正传〉的生成》，《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④ 姜异新：《“百来篇外国作品”寻绎——留日生周树人文学阅读视域下的“文之觉”》（上下），《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2期。

⑤ 见张旭东以下论文：《漂泊之路上的回忆闪烁——〈朝花夕拾〉与杂文风格发展的缠绕》，《文艺研究》2022年第4期；《批评对象的重建：鲁迅文学风格的复杂性、统一性与历史性（上）（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4—5期；《在路上：漂泊、书信体写作与“杂文自觉”的风格扩张》，《学术月刊》2022年第6期；《希望与躁动：鲁迅杂文发生学小史（上）（下）》，《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8—9期。

⑥ 邱焕星：《“中期鲁迅”研究刍议》，《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⑦ 郜元宝：《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述综论（一）—（六）》，《小说评论》2022年第1—6期。

⑧ 吴岩主编：《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化的吸收与外来经验的接纳,勾勒出丰富的历史脉络。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①则是一部更为专深的著作,作者抓住当代科幻小说转型过程中的典型现象,重点讨论科技与人的关系、工业现代性美学、外来影响与中国性建构等话题,在学理层面厘清其文类特征与价值体系,进一步将科幻文学的内涵推向深层。宋明炜写作了题为《在“世界”中的中国科幻小说》^②的重要论文,剖析中国科幻小说作为一次新浪潮所引发的“全球”影响,探讨其进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他的研究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思辨色彩。除了科幻热以外,另一个前沿的议题是人工智能文学,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幻文学中经常出现人工智能的形象,而人工智能与文学的关联也指涉性地体现在科幻的叙事之中。在科学技术进入人文领域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开始不断地参与到各种体裁的文学生产中,从而催化出人工智能文学。作为一种试验性的文学形态,其实践特征、发展逻辑与美学原则等引发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张斯琦讨论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叙事功能和传播演变^③;黄平引入控制论的视野,分析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之间的关联,并且尝试讨论“情感”从“机器”中突围的可能性^④;朱恬骅认为人工智能文学通过表达性重复实现了“文本实验”向“实验文本”的转变,从而获取文学价值自证^⑤。在具体的文本实践层面,研究者主要聚焦在对机器人小冰写诗这一文学事件的分析,比如霍俊明、李静等人都写过相关的论文。^⑥ 总之,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文学有力地拓展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随着传播媒介的急剧变革,文学也进入到了巨大的变局之中,这不仅指代文学写作,同时也是指文学研究的方式,新的情感结构与阅读经验正在召唤着新的分析方法与理论工具,这就要求研究者紧跟时代脉搏,不断地调整自身的主体位置。

走向学科的多元反思与建设

总体说来,2020—2022年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无论是在内容与观念层面,抑或是研究方法、视野、路径上,皆有十分丰富的呈现。史料研究、作家作

品、文体诗学、思潮流派、文学制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渐成海纳百川之势,并且某些研究已经形成了跨学科的特质,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大众文化、新媒介理论等的融合愈发紧密。而以上选择评述的这些成果,虽然角度各异,立场有别,但表现出一个显著的共性,即并不仅仅就某一具体论域展开,而是在各自问题意识的表达中蕴含着对文学史研究乃至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意识,因而具有特定的延展性与导向性。这些缤纷多元的学术实践昭示出一个潜在的价值规律:即文学研究永远是在对既有学科自律的冲击突破与新一轮的学科制度建设这两种相反相成的辩证运动中,抵达意义的深度。不过,尽管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仍需警惕具体研究过程中存在的若干倾向,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其一,部分学者无意识地秉持着理论先行的思维模式,他们立足于创新的要求提出某种预设性的整体框架,但往往缺乏对于这一框架本身的审视,没有厘清其应用的尺度与边界。理论概念与具体文学对象之间的适应性有待加强,这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过度诠释的问题,某些研究沦为从概念出发到验证概念的闭合演绎。其二,随着研究边界的不断拓展,学科内部也出现了某种“非文学化”的危机,部分学术论文表现出十分吊诡的形态,呈现为某种没有具体文学文本支撑的文学现象研究或文学史研究。当“文学性”的范畴被放逐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之外,当外部材料的阐释代替了艺术性的鉴赏,这种文学研究方式自身的合法性也就值得严重怀疑了。简言之,如何做到理论、史料、文本的贴合无间,如何使得社会历史与文学文本激发出彼此的动能,如何在审美维度与政治维度之间建立呼应联动的关系,依然是我们需要不断去探索提升的要点,这也是进行学科反思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王海晗,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杭州311121);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200241)。]

(责任编辑:张曦)

① 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② 宋明炜著:《在“世界”中的中国科幻小说——科幻作为一种全球文类,及其成为世界文学的可能与问题》,汪晓慧译,《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2期。

③ 张斯琦:《人工智能时代文学叙事功能与传播演变审思》,《求是学刊》2020年第3期。

④ 黄平:《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

⑤ 朱恬骅:《从文本实验到实验文本:“人工智能文学”的表达性重复》,《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

⑥ 霍俊明:《“克隆体李白”与百万亿首诗——AI诗歌的“类文本”生产与可能前景》,《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李静:《赛博时代的“创造力”:近年诗歌创作中的“机器人”与“人拟机器人”》,《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